

走向平衡的增长

30年

改革开放的大国发展道路

主编 | 张 晏
章 元
陈 钊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走向平衡的增长

30年

改革开放的大国发展道路

主编 | 张 晏
章 元
陈 钊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向平衡的增长:30年改革开放的大国发展道路/张晏,章元,陈钊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1

ISBN 978-7-301-14446-6

I. 走… II. ①张…②章…③陈… III. 改革开放—研究—中国 IV. 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70997 号

书 名:走向平衡的增长——30年改革开放的大国发展道路

著作责任者:张 晏 章 元 陈 钊 主编

策 划 编 辑:朱启兵

责 任 编 辑:朱启兵

标 准 书 号:ISBN 978-7-301-14446-6/F·2042

出 版 发 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926

出版部 62754962

电 子 邮 箱:em@pup.pku.edu.cn

印 刷 者: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720 毫米×1020 毫米 16 开本 26.75 印张 400 千字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0001—5000 册

定 价:49.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作者简介

陈杰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住房经济学,电子邮箱: jiech@fudan. edu. cn。

陈小飞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学生,电子邮箱: so-sophia13@163. com。

陈钊 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复旦大学产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为激励与信息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当代中国经济,电子邮箱: zhaochen@fudan. edu. cn。

程锋 复旦大学国际金融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际金融学,电子邮箱: iamcf@163. com。

丁绎镬 复旦大学经济学系学生,电子邮箱: 0415002@fudan. edu. cn。

封进 复旦大学经济学系和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劳动经济学、健康经济学,电子邮箱: jfeng@fudan. edu. cn。

蒋仕卿 复旦大学经济学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劳动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电子邮箱: shiqing. jiang@gmail. com。

金戈 浙江财经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增长理论,电子邮箱: free-bluesky2002@126. com。

寇宗来 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复旦大学产业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学,电子邮箱: zlkou@fudan. edu. cn。

刘晓峰 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发展经济学,电子邮箱: 062015025@fudan. edu. cn。

陆铭 复旦大学经济学系教授,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劳动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电子邮箱: lm@fudan. edu. cn。

罗长远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欧洲问题研究中心讲师,同时兼职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经济学,电子信箱: chyluo@fudan. edu. cn。

潘士远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发展经济学,电子邮箱: shiyuanpan@zju. edu. cn。

王永钦 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发展经济学、合约理论。电子邮箱: yongqinwang@fudan. edu. cn。

徐现祥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经济增长理论与政策,电子邮箱: lnsxuxx@mail. sysu. edu. cn。

许庆 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学,电子邮箱: xu. qing@mail. shufe. edu. cn。

杨长江 复旦大学国际金融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国际金融,电子邮箱: chjyang@fudan. edu. cn。

杨其静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企业与组织研究中心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企业与契约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电子邮箱: qijing_yang@ruc. edu. cn。

余央央 上海市发展改革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卫生经济学、社会保障,电子邮箱: yyangyang8700@tom. com。

张军 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经济,电子邮箱: junzh_2000@fudan. edu. cn。

张晏 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公共经济学、中国经济,电子邮箱: yanzhang_fd@fudan. edu. cn。

章元 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农村金融与农村贫困问题,电子邮箱: zhangyuanfd@fudan. edu. cn。

序

《走向平衡的增长——30年改革开放的大国发展道路》是我在复旦大学的年轻的同事们主持编写的一本探求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著作。这本书的内容让我脑海中不断闪现出中国经济这30年的变迁片段。这些日子我也不停地问自己,什么是经济发展和转型的中国模式?它的逻辑能被解释吗?中国经济的未来取决于今天的这个模式吗?它可以在别的国家推广和被复制吗?我相信,这些都是重要的话题,将会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试图回答它。

回顾这30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多次经历曲折和震荡。20世纪80年代中,脆弱的经济遭遇几乎失控的通货膨胀的袭击;80年代末,经济改革与发展因为政治风波与外交动荡而进入低潮;90年代初,宏观经济再次失控,面临崩溃的巨大风险;90年代中后期,不仅受到国有部门结构性改革的阵痛与失业剧增的紧缩影响,同时也受到亚洲金融风暴的牵连,内外夹击,经济再度下滑;进入21世纪,国际贸易的摩擦和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与压力与日俱增,困扰中国经济前进的步伐。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中国的经济体制还处于形成和不稳定时期,还需要不断改革和完善,超常发展的经济还暴露和衍生出很多重大的具有挑战性

的问题需要解决。收入差距和地区差距在拉大,生产率增长不稳定,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决策不够透明,行政垄断和腐败依然存在,城市化进程缓慢,城乡依然分割,由经济发展引发的社会矛盾和对公平正义的呼声有增加趋势。

但是,中国没有垮掉。中国在不断改进自己的体制,不断发现问题和纠正错误,不断寻找着以最小成本解决问题的方法。事实似乎是,中国这种体制积累起来一种开放性和学习能力。它虽滋生利益集团但也能阻止利益集团的强大;它还缺乏成熟的协调利益冲突的机制,但却拥有不断去适应新的变化了的社会结构与舆论环境的智力资源;它善于从过去吸取教训和总结经验,不断提升治理水平。中国经济仍在飞速发展,而且伴随经济发展的是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的进步。如果看不到中国在意识形态和体制变革上取得的进步,那是不公正的。

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具体的体制一旦形成,都包含着一个利益分配的格局,形成一个均衡,要改革体制并不容易。与很多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很幸运地没有跌入到一个低水平的制度均衡中不能自拔。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体制的确有所不同。一个重要的事实是,中国是一个还不富强而人民渴望富强的国家。13亿人民要求富强的愿望和意志事实上在主导着这个国家的政府和政策。只要回顾过去就会发现,在中国,体制的调整总在进行,均衡不断被打破,而且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总是在朝着我们希望的方向发展,无论我们是中国的批评者还是中国的辩护者。

但是,坦诚地说,经济学家还不能对一个制度变迁的轨道给出具体的说明和预测。的确,中国经济在发展。快速的经济发展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和经济的持续繁荣。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可以让这个经济像伦敦道克兰的轻轨火车那样自动行驶在通向繁荣的轨道上。经济总量扩张带来的结构性变化和社会变迁也产生出了大量的问题,挑战我们的心智模式和制度,让我们后面每一步的发展都面临重大的选择。于是,中国经济的变迁不仅把我们卷入了一场大规模的社会实验和制度变迁的历史进程中,而且让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参与到观察和研究这场精彩的经济变迁与制度转型的过程。

对于现代经济学训练出来的中国年轻一代经济学人而言,身处这个经济转型的时代和经验背景,如果不去参与到观察和研究这个大国经济的队伍中,

我们丢掉的将是一代人可能为经济学作出贡献的机会。而事实上,大概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的至少 15 年时间里,中国经济研究的真正队伍和舞台仍是在西方。这可以从研究的项目、学术会议和发表的论文著作中得到证据。但是最近 10 年来,这个局面开始被扭转。中国本土的经济学家开始努力作自己的研究,把研究推向国际,在研究水平和研究条件上努力缩小与国际间的差距。进入 2000 年后,中国更是吸引了大量留学海外的年轻一代的经济学家回国加入这个团队,增强了中国人对中国经济的研究能力。

在复旦大学就活跃着一批这样的年轻的经济学者。他们大都是 70 后生人。他们在学生时代热爱经济学,勤于思考。更可贵的是,他们以开放包容的心态为基础、以本土问题为导向,持续关注着中国经济的变化。他们充满着学术热情和团队精神,发挥合作研究的优势,不遗余力地致力于中国经济研究。这些年来在中国经济研究的领域崭露头角,成为新生代的实力派中国经济学人。

我知道,最近两三年,他们积极探索大国经济发展模式,反思中国发展的代价,发表了不少有影响的作品。这些作品构成了这本书的一个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和上海财经大学的同龄学者也加盟其中。本书分 15 个论题,包含了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领域。

2008 年,中国迎来了她经济改革 30 年的重要纪念日。“如果说 20 世纪终结于 1989 年,那么 21 世纪开端于 1978 年”,这是 2006 年 5 月 25 日在英国《卫报》上使用的一个标题。作为回顾和反思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 30 年的著作,本书除了对重要改革内容进行描述之外,也试图寻找构成中国大国平衡发展模式的框架。不用说,这是一个艰难的智慧之旅,没有人走在更前面。我相信他们的努力是会有很大的边际回报的。

张 军*

2008 年 4 月 18 日
于耶鲁大学

* 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走向平衡的增长

——30年改革开放的大国发展道路

前 言

在“30年”与“60年”之间

——历史与全球视角下的大国发展道路 张晏 陆铭(1)

第一部分 中国的政治社会结构与经济增长

1 中国的大国发展道路

——论分权式改革的得失 王永钦 张晏 章元 陈钊 陆铭(15)

第二部分 中国的经济改革与不平衡的发展

2 重构“三角链”: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改革、

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 陆铭 蒋仕卿(39)

3 安得广厦千万间:中国城镇住房体制市场化改革的

回顾与展望 陈钊 陈杰 刘晓峰(64)

4 基础教育的效率与公平:市场化改革应调整

“方向”还是“方式”? 陆铭 蒋仕卿(88)

5 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市场化、激励机制与政府的

作用 封进 余央央(115)

2 走向平衡的增长

——30年改革开放的大国发展道路

- 6 国企改革:在摸索与争论中前进 杨其静(148)
- 7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变迁、特点及改革方向 许庆(183)
- 8 一个“农业大国”的反贫困之战
——中国农村扶贫政策的得失 章元 丁绎璞(208)

第三部分 中国的经济开放与发展战略调整

- 9 经济特区:中国渐进改革开放的起点 徐现祥 陈小飞(239)
- 10 转型时期的外商直接投资:中国的经验 罗长远 张军(272)
- 11 从鼓励模仿到激励创新:中国科技体制改革30年 ... 寇宗来(296)
- 12 人民币实际汇率调整趋势与中国经济转型 ... 杨长江 程峰(332)
- 13 发展战略、产业政策与产业结构变迁
——中国的经验 潘士远 金戈(359)

第四部分 结 语

- 14 适宜制度、经济增长与发展平衡
——中国的大国发展道路及其世界意义 陆铭(399)
- 后 记 (416)

前言 PREFACE

前言

在“30年”与“60年”之间

——历史与全球视角下的大国发展道路

张 晏 陆 铭

1978年,重新回到国际经济赛场的中国带着伤痛,情绪也很低落。这只是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小组赛,我们这个大个子选手并不被世人看好。发令枪响,大个子振作精神,但他只知道大概的方向。管不了那么多了,跑起来再说。这条赛道似乎并不平坦,大个子的身体严重倾斜,好在步子足够大,耐力好,快跑了30年,大个子得了个小组第一,而且是遥遥领先。

2008年,新的比赛即将开始。这一回,同场竞技的都是巨人。中国不太可能再保持前30年小组赛的速度,然而,中国似乎也不再像从前那样在意速度。既然已经成了一个巨人,那么,比速度更为重要的,将是道路的选择。中国人已经学会了用头脑去谈发展,而不是只用体力。

即将迈入2009年的中国就站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起点”。在结束改革开放30周年的纪念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又将迎来她的60周年庆典。在共和国的第一个30年,政府在所有的领域里,都用一只“看得见的手”支配着人们的生活。而在第二个30年里,中国政府主动而广泛地退出了经济资源的配置,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逐渐长大,并且最终与“看得见的手”握在了一起。

站在“30年”与“60年”之间看当代中国发展的历史，是一件非常饶有兴味的事。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也是不断调整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的历史。从大一统的计划经济，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再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直至十四届三中全会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方面政府对市场的干预逐步减少，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范围和作用逐步扩大。无论是产品市场，还是劳动力、土地等要素市场；无论是企业领域，还是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领域，市场化是改革开放30年的大方向。但是，同样在这些领域，矛盾、问题和成就并存。当市场分割、户籍管制、房价上涨、公用事业垄断、公共服务低效、社会不公与收入差距扩大这些问题摆在人们面前的时候，人们意识到，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原来如此之复杂……

一、政府与市场：为什么教科书是不够的？

仔细去看经济学的教科书不难发现，那些被称为“传统智慧”(conventional wisdom)的知识在根本上是要为市场和政府立法。在一些“标准的”假设之下，市场价格可以被证明为能够有效配置资源的机制。但是，如果市场失灵了，比如说出现垄断，产生外部性，或者无法提供一些对于社会来说非常重要的产品和服务，那么，政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纠正市场的缺陷。在花了几十块钱，买了本经济学的教科书读完之后，我们是否已经理解了中国？答案是“差得远”。

杰弗里·萨克斯在他最近的《贫穷的终结：我们时代的经济可能》一书中宣称，“我本人花了20年的时间才知道什么是好的发展经济学，并且仍在学习之中”。他认为，“为一个经济体(尤其是贫困、不稳定的经济体)提供政策建议的挑战与临床医学面临的挑战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发展经济学的实践还不能承担这个任务。经济学家不是像临床医师那样训练出来的，他们的高级课程训练很少提供临床练习。”^①无独有偶，一种被称为“增长的诊断学”

^① Sachs, Jeffrey D., 2005, *The End of Poverty: 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Time*, New York, Penguin Press. 此处引文出自此书的中文版《贫穷的终结：我们时代的经济可能》，邹光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67、70页。

的理论正在兴起,“试图以均一的增长战略来指导所有的国家,而忽略它们的具体国情,基本上被证明是没有效果的。增长的战略可能应该根据各国国内的机遇和约束而有所区别。”^①

那么,在中国的转型与发展进程中,什么是中国“国内的机遇和约束”?什么是适应中国国情的增长战略?

人们常常说中国是个“发展中大国”,但这个词常常被作为强调中国的与众不同的借口。必须承认,经济学的“传统智慧”并不是错的。产权依然是重要的,市场导向的激励机制依然是重要的,法律制度依然是重要的,平稳的货币政策和可持续的财政支出同样依然是重要的。但是,“传统智慧”却在解决发展中大国的实际问题时遇到了两个重要的难题。

一个难题是,中国很大,无论从面积、人口还是经济规模来说,中国都是一个大国。对于中国来说,任何的改革方案必须在一个大国的治理结构之下是切实可行的。中国的大国治理是怎样的?自古以来,当中国成为一个统一的大国之后,这个国家的治理结构首先要实现的目标就是“统一”。统一的重要性不仅仅是政治和军事上的,事实上,政治和军事上的意义本身就可以被经济学理论合理化。其中,“规模经济”是非常重要的。政治上的规模经济在于,中央政府的管理成本可以在较大范围内被分摊。在军事上,规模经济的好处更加显而易见,举大国之财力、物力和人力比较容易实现军事的强大,其根本原因同样在于大规模的军事支出可以被大国的国民所分摊。

但是,大国的治理面临另一个难题,那就是,如果同时在经济上将权力收到中央,那么,中央政府在信息上的劣势将导致经济发展的低效率。中央计划经济的实践在本质上给出的恰恰是这个教训,而与“主义”没有必然的关联。因此,在历史上,直到今天,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没有摆脱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这样一个基本有效的治理结构,也承受着这个大国治理结构所带来的各种弊端。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至少说明,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的大国治理结构对于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是适宜的。

“发展中国家”,当人们将中国归为这一类别的时候,通常也用贫穷、工业

^① 参见 Hausmann, Ricardo, Dani Rodrik and Andrés Velasco, 2005, “Growth Diagnostics”, Working Paper, Harvard University.

化和城市化水平低等发展中国家的共有特征来描述中国。这样做对学术研究的好处是,根据社会科学传统的学科边界,政治、社会的发展可以与经济的发展分开来讨论,于是,经济学家们可以专注于研究如何治理贫困,以及如何提高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仿佛发展的问题就这样被解决了。现实却不是这样。

当代中国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可以用“转型”与“发展”两个词来概括。^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只是当代中国“发展”的一个历史瞬间,中国发展所提出的深刻问题在于,如何在发展的过程中持续地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更为深刻的问题是,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的治理结构如何进行调整,以使得政治和社会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保持协调?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需要一个动态的理论,一个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而经济学的“传统智慧”本质上是一个静态的理论,一个参照系,很少讨论政治、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更不要说把大国作为一个特征(或者说重要的参数)引进来了。

在中国经济改革的30年里,在一个市场还不完善的环境里,政府推动了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在商品市场,伴随着双轨制的实行,市场竞争不断加剧,物品的多样性不断提升;在劳动力市场,新生经济体的出现促进了人力资源的快速流动;在房地产市场,20世纪90年代后的改革提高了居民住房水平和购房自由;在企业领域,从放权让利的尝试到多种所有制并存,从价格双轨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企业活力日趋增强;……由于私人部门还比较弱小,政府还承担了许多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由私人部门承担或参与的功能,包括产业投资,以及基础设施建设。

在标准的经济学理论里,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主要是对立的,有时,它们相互补充,共同工作,但是大多数时候,政府与市场是互相作为对方的替代机制而发挥作用的。特别是,经济学有一套完整的理论,说明在市场能够发挥资源配置功能的条件下,政府不可能做得比市场更好。但是,中国的发展经验——甚至包括其他东亚新兴工业经济体的经验——却说明,政府可以与市

^① 这也是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双年学术会议”的名称。

场合作,推动经济的发展,至少,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这是可能的。

二、市场化:为什么历史与发展阶段是重要的?

无论对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持有什么样的态度,在经济发展的绩效这一点上,恐怕任何人都否定不了中国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巨变这个事实。要知道,30年对于经济发展来讲,就算不是马拉松,也肯定不是100米短跑。我们这个大个子运动员身体素质并不太好,但他居然跑了个小组赛第一,而且他的速度打破了发展中国家高速增长的世界记录。^①

中国的表现如果不是改变了,也至少是加深了人们的三点看法:第一,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是可能成功的;第二,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和法制对于发展可能是重要的,但不是必要的;^②第三,根据发展的特定阶段采取正确的政策,对于发展的成功而言是重要的。让人有点无奈,甚至有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在这三点上,标准而主流的经济学没有提供什么知识,当写满数学公式和图表的经济学教科书被学生们熟练掌握的时候,他们基本上得到的是与发展无关,甚至与中国或东亚经验有些相左的认识。

让我们重新来思考一下什么是一个好的发展模式?简单地说,它应该是正确的目标+正确的资源利用方式。在标准的经济学理论里,目标不重要,用亚当·斯密的话来说,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这时,只要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发挥作用,就能够自动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后来,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基本上是在为这个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寻找条件,或者说明,当市场自动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条件不满足时,该怎么办。

不幸的是,在经济发展的早期,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脱胎于完全政府计划管制的经济,市场是没有的,即使有,也是残缺的,至少这个市场上的价格信号不可能从一开始就准确地反映资源的相对稀缺性,并且被各类参与市

① 这个世界记录没有包括那些面积或人口和上海市差不多的国家。

② 研究发现,东亚经济体的确增长更快,但被很多人相信非常重要的“民主”制度却并不显著影响长期增长。参见 Sala-I-Martin, Xavier, Gernot Doppelhofer, and Ronald I. Miller, 2004, “Determinants of Long-Term Growth: A Bayesian Averaging of Classical Estimates (BACE) Approac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4(4), 813-835.

场交易的经济主体了解到。在这样的条件下,政府就重要了,政府的目标也变得重要了。由于大量经济活动并不必然基于民众最大化自己利益的动机,政府作为民众的“代理人”是否会追求社会利益,就变得非常重要。有趣的是,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不仅在中国,在整个东亚,政府都是“发展型”的,换句话说,不知道是什么神奇的力量使得东亚地区各国政府“自动地”成了追求经济发展的政府。这也许是儒家文化的作用?在中国,这可能还因为过去几千年的辉煌与百年的屈辱史的强烈反差,或许还因为“文化大革命”之后执政党励精图治的决心?对于习惯于实证主义的研究方式的经济学家来说,比较明智的做法是把“发展型”政府当做一个事实,而暂时不去深究其原因。

好的发展模式=正确的目标+有效的资源利用方式。在1978年以前,缺乏经济建设经验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采取了计划加国有的资源利用方式。当时,苏联经验似乎是成功的,在信息和激励经济学产生之前,经济学也没有足够的说服力来证明计划经济不可能成功。等到理论上清楚了,实践上明白了,中国已经在计划加国有的目标模式下走过了将近30年。没有有效的资源利用方式,徒有正确的目标,中国在1978年之前走的道路为“计划加国有不可能成功”的道理增添了一个案例。不过,客观地说,在经济建设领域,计划经济年代取得的成绩也是显著的,至少,中国在基础设施、教育和卫生事业、减少贫困、完整的工业体系、战略性的产业这些方面拥有不俗的表现。

1978年以后,发展经济的目标被励精图治的决心加强了,这时,只需要一个正确的资源利用方式。而唯一的选择就是市场——政府从经济领域内逐步退出,能让市场发挥功能的地方,就尽量让市场去做,而且是政府推着市场去做。政府在看不清方向的时候,民间先做,成功了,政府再推广。中国的经济改革成为了20世纪最伟大的事件,而且其影响波及21世纪。

中国在市场化的道路上做了四件事:

第一,价格自由化。中国已经有的“市场”没有自由的价格,就让价格逐步自由化(通过商品市场的“双轨制”)。对于从来没有过的市场,就开辟那些市场(比如资本市场、土地市场)。

第二,产权非国有化。中国不像前苏联,前苏联在转轨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国民都处在国有制的笼罩之下,而在1978年的中国,至少广大的农村实行

的是濒临破产的集体经济，在城市，集体经济也占有很大的份额。对于这个部分，只要政府放松管制，民营经济就稳步成长。最后，当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形成直接的竞争的时候，国有经济也被逐步地非国有化，以适应市场竞争的挑战。

第三，经济全球化。中国经济改革之所以成为20世纪最伟大的事件，其实不全是因为计划经济的结束，更重要的是，中国打开国门之后，廉价劳动力——特别是来自于内地农村的廉价劳动力——与全球范围内的资本结合，成为新一轮的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力量，而且深刻地改变了全球的经济版图，特别是制造业的布局。

第四，市场竞争化。在一切经济资源都由国家统收统支的体制下，全国实际上只有一家企业，所有的行业、所有的企业实际上都没有竞争。民营经济的发展和贸易的开放，使得传统的国有部门开始面临越来越多的竞争。为了加强企业的应对能力，政府将企业的管理权层层下放，将企业从简单的利润核算中心转变成了独自应对市场竞争的、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

就这样，中国在政府的领导和规划下，完成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经济分权加政治集权的大国治理结构在中国的成功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为了不再重蹈中央计划经济的覆辙，中国政府将大量的经济决策权层层下放到地方政府。增长至上的发展目标演变成了对于地方政府官员进行考核的可实施的指标，地方政府为了发展、为了增加税基，同时又面临着来自其他地区的竞争，唯一的选择就是融入市场化改革的时代洪流。

在“不争论”的保护伞下，目标正确，方式对了，中国成功了。这句话可能也同样适用于发展早期的其他东亚经济体。政府和市场的成功结合，肯定不是必然的，但至少是可能的。其中的风险在于，如果目标错了（缺乏好的领导人），或者方式错了（比如采取了计划和管制经济体制），或者两者都错了，对于经济发展而言可能是场灾难。而如果目标正确，方式对了，经济决策的效率就可能更高，经济绩效的表现就可能更好。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对于发展来说意义重大。这一点，并非只在东亚（包括中国）成立。在拉美，似乎政府并没有发展的共识，相反，政府却更像一只攫取之手。在俄罗斯，同样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曾经在一夜之